

习近平全球问题论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新境界

裴长洪, 倪江飞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今世界形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等重大理论观点,随后发表了四大全球倡议以及全球南方现代化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阐释这一系列全球问题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是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是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的基础来源。本文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基础,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认识、新观点,进而论证了习近平关于全球问题系列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与时俱进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中探讨了习近平论述的理论逻辑的科学意义。得出结论,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思想、新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开放型经济理论

面对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列,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全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观点,为历史前进指明了方向。继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提出“开放型世界经济”概念后,2021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与此同时,2024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新概念。这一系列关于全球

作者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倪江飞,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通讯作者:倪江飞,电子邮箱:nijiangfei2014@163.com。

问题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思想、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世界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世界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揭示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始终具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体系。研究阐释习近平关于全球问题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中探寻其理论逻辑的科学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跨国界的发展,无论资产阶级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把世界经济问题纳入各自的研究视野。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围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威廉·I·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六册结构计划”中都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列宁论述了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瓜分,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其研究领域都超越了国际贸易,形成了各自的世界经济理论。因此,世界经济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分支。而本文的宗旨是梳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发展的脉络。

1. 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象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世界性基本矛盾:“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的根本动力。对此,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③,列宁则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而是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够在不变的条件下以原有的规模重复同样的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生产过程”^①。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②。最终导致世界性的生产过剩,演变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在这里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世界市场扩大有限的矛盾。建立在世界市场之上的各种联系和经济结构,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关系,并由此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商业制度、贸易规则等世界性制度框架,反映并维护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③世界性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当时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发出了时代的呐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国际价值规律的性质和作用

马克思通过论述对外贸易与国际分工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国际交换和贸易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本质,这也是剩余价值在国际分配的规律。马克思说,各国基于中等劳动强度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国内价值,而世界市场上“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因此,同一劳动时间,在不同国家生产的各种商品具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与价格,“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④在世界市场中,国内的利润率平均化再次转化为国际的利润率平均化,“虽然所形成的利润率的水平可能不一样了,因为国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已经有一部分让给国外的买者了。”^⑤因此,进口商的利润实际上来源于出口国生产者的剩余价值。

在国际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国际交换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国家一个工作日的劳动产品可能与另一个国家三个工作日的劳动产品交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⑥这表明,等价交换并不等于平等交换,只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④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5页。

⑤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6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2页。

有当各国劳动生产率相近时,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商品量和创造的国际价值量基本相等,二者才可能统一。而在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情况下的两国贸易,即便按照国际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仍然是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富有的国家可以用少量劳动量换取贫穷国家较多的劳动量,落后国家即使得到利润,但总是吃亏。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在国内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价值之下来支付,而在国外却抬高到价值之上来出售,从而得到双重的好处,这正是资产阶级及国家高度重视国际贸易与开拓世界市场的真实原因。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①，“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②

3.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重性

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 这个历史事实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如毛泽东所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④,该体系无疑存在国内剥削和国际剥削的本质属性,也具有市场经济规律的一般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市场作为配置全球资源的手段,有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世界性的生产和国际分工的扩大,使世界市场配置全球资源成为可能。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特征日益明显,国际分工在空间上不断扩大,在产业间和产业内不断深化,世界市场支配着全球生产以及生产资源的流向,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一方面,世界工业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同时与殖民地、附属国形成垂直分工关系;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水平型分工,提高了资本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形成了国际市场中心化和世界货物定价中心化,不仅初步奠定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也强化了世界市场机制的功能,使资源配置范围和效率达到新水平。

对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马克思同样持辩证态度。落后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交换的过程中,“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⑤ 这就是说,落后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8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6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5页。

国家在出口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在进口方面可能得利。尽管这一分析是建立在发达国家遵守“自由贸易”规则的假设上,但毕竟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口头上高喊的“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原则为自己的利益抗争,谋求国际贸易治理的干预。总体而言,贸易可使双方都获利,但利益分配不均。如何使落后国家获得更多利益,是国际经济治理的重大课题。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国际价值由世界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背景下,参与世界市场经济贸易活动的国家固然都受益,但受益程度不同。总体上看,劳动生产率越高,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就越大,受益就越大。这就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平等贸易关系指明了方向。那么,中国既与发达国家开展贸易活动,也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是否也存在“等价交换”与平等交换的不统一问题呢?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不是中国自身意愿问题,而是现实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国际价值规律运行的客观结果。中国所能做的事情是,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不以垄断价格方式违背国际价值规律的商业道德。同时,一方面,在国内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平等交换;另一方面,在国外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使之也缩小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从而促进它们与发达国家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平等交换。

4. 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多样性及其必然性

列宁把垄断资本主义称作帝国主义,并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论》)一书中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定义和五个特征。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及英国背景不同,列宁身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相对落后的俄国,他不仅洞见了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揭示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国际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这些矛盾同样是世界基本矛盾的体现,且后两种矛盾要比第一种矛盾更尖锐、更突出,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在这三种矛盾交织迸发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率先取得一个国家的胜利。这就是列宁时代的世界经济理论的核心要义。

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市场、争夺世界经济体系主导权的基本规律: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已把世界市场和世界领土瓜分完毕,但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支配下,这种固定的平衡无法维持,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领土,“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①。同时,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也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2页。

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的问题,从1914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列宁的上述论断,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源,也指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二、新中国成立后对世界经济理论的探索

1. 对“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中国只能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部分亚非拉国家中认识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国在接受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中也接触到斯大林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

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总体危机阶段,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获取的世界资源和市场收窄,企业开工不足现象加剧。他得出推断: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由此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据此认为,列宁1916年春天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仍可能实现更快发展的判断已经过时,应予以修正。^②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方针,也是成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的理论基础。“经互会”最初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组成,后逐渐拓展至蒙古、古巴、越南,发展成为跨欧、亚、美三大洲的国际组织。

中国没有加入“经互会”,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这一理论怎么看?从公开文献中找不到很直接的表态。但是,从毛泽东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态度和认识上看,是谨慎和有所保留的。首先,毛泽东自己说,从感情上他不喜欢斯大林,“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其次,他认为斯大林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③再次,关于中国革命,他指出斯大林有四条错误。^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上,与斯大林关于“两个阵营”“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观点就不一致。1949年12月,在准备与苏联签订贸易条约时,毛泽东对中央提出:“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

^① 参见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4页。

^②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3—25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①。这里说的“全局”显然不是以“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作为出发点考虑的,而是指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贸易关系。他鼓励英国人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主张“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靠拢些”^②,1956年,毛泽东已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③。1959年,毛泽东提出:“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④这等于公开质疑了“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公开批评了苏联把持的“经互会”中的国际分工观点。他说,教科书的主张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⑤这显然是对“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工的批评和抵制。

历史证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在实践上难以持久,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苏联自身不可能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贸易联系,而且苏联自身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比较低。1950年,苏联外贸总额为33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614亿美元的5.4%;1981年,苏联外贸总额提高到1524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19620亿美元的7.8%。就“经互会”整体而言,1950年外贸总额也仅为73.76亿卢布,约折合82.6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不足13.5%;1986年外贸总额提高到2951.35亿卢布,约折合4102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21385亿美元的19.2%。这说明,无论是苏联,还是“经互会”整体,对外贸易规模占世界比重都有限,很难保证其自身的独立性,很难不与“经互会”以外的国家发生经济贸易联系。事实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联系在其对外经济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983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30.1%。同期,“经互会”同外部经济体贸易在其贸易总额中仍占相当比重,1987年为34%。^⑥1988年“经互会”不得不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经济贸易协议,可见当初所谓平行的独立世界市场只是一厢情愿。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互相协作,完全可以不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资

-
-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⑥ 有关数据引自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650、658页;杨家荣:《经互会四十年:成就、问题与前景》,《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6期。根据各数据测算,20世纪50年代卢布与美元的兑换率为1:1.12;80年代达到1:1.39。1986年世界贸易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金、技术就能满足需要的观点是错误的。“经互会”成员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实践表明,仅在“经互会”范围内开展经济合作远不能满足各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先进科技、资金、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都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里,不与它们发生经济合作关系,就等于拒绝吸收外来先进事物,这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

其理论上的错误有两点:一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新的生产方式是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孕育成长的,与旧制度相伴相生,此消彼长,是统一体中的新旧两方面事物。新事物摧毁旧制度也是在共同的母体中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因此,“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二元论。二是明显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实行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这样的境地:它们敲诈我们,逼我们付出高价,但不管怎样还是在帮助我们的经济……这些国家宣布我们是罪犯,但还是在帮助我们。结果,它们在经济上同我们分不开了。”^②可见,列宁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经济的存在就必然分裂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各国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条件上的差异、经济管理水平的不同,必然造成各国科学技术的互相引进、取长补短和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而这种互相引进、互相依存都是通过统一的世界市场实现的,同时反过来扩大了世界市场。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世界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由此,本文得到的重要理论启示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确实使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等于形成了单独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不等于使资本主义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和终结。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仍在世界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经济的出现,并未创造一个完全独立、平行的新市场,而是使原本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部出现了新旧矛盾事物并存的局面。这就是事物运动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实践中才能发展壮大。

尽管如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经互会”的实践不应当被全盘否定。该组织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经互会”在多数时期均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例如,1950—1983年,“经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331页。

互会”国家的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为6.7%，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3.8%；工业产值的年增速为8.3%，也远超后者的4.2%。即使在1970—1983年增速放缓阶段，其国民收入累计增长181%，仍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42%）和发展中国家（167%）；工业产值增长200%，同样显著领先于另两组别（分别为137%与174%）。具体到成员国，苏联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有20多种重要产品，其中包括19种重要工业产品（如钢铁、石油、焦炭、水泥、机车等）的年产量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原以农业为主的东欧国家也逐步建立起特色的工业体系，如保加利亚的电机工业、匈牙利的电子工业、罗马尼亚的机床制造等。即使是经济落后的蒙古，也建成了200多家工业企业。经过20多年，“经互会”按人均计算的产品总值和国民收入达到了世界中等水平。作为整体，“经互会”占世界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50年的15%升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5%，工业产值占比由18%增长至约33%。^①

2.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世界经济政治有新的思考，多次提出“中间地带”的国际格局问题。他认为，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分化为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或反帝国主义一边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现在有些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民族主义国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中立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② 1963年底至1964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认识，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③ 由此认为，第一个中间地带和民族民主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军，第二个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苏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因素，是我们的间接的同盟军。

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观点大大拓展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驰骋空间，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也开辟了新的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渠道。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毛泽东委托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他们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判断：一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导力量是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二是美苏均以中国为敌，但又互以对方为敌。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的重要市场，也是其安全屏障，这是美苏争夺战略利益的重点。在对付中国问题上，美苏都希望对方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美苏单独

^① 参见杨家荣：《经互会四十年：成就、问题与前景》，《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6期。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1、402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

或联合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三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①基于这些战略判断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的战略设想,对1970年之后中美关系的战略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中国坚定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经济独立斗争的立场,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在1971年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中国重返联合国赢得压倒多数的支持。这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外交局面,构成毛泽东从“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观点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现实基础。

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②,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他指出,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③“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贡献是:

第一,突破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局限,真正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一元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中,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矛盾,提出了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列宁在世界性的基本矛盾中看到了矛盾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并预见到多种矛盾迸发带给俄国工人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机遇。毛泽东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考察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多种矛盾形态,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主要矛盾,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对人类利益的最大威胁。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团结发展中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在世界上建立最广泛的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含义及其实践指导意义。

第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在这个条件下,工人阶级

^① 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214—220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1页。

^③ 参见杨胜群、闫建琪:《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11、2012页。

没有祖国。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捍卫苏维埃国家政权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和抵抗帝国主义入侵,保卫本民族国家免于沦陷和灭亡,既是这个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①,这个口号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发展。同样,今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捍卫本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符合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既是国际主义的,也是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站在斗争的前列,既捍卫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捍卫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结论是,当代世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世界经济政治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

三、改革开放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结束了封闭与半封闭状态。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理论认识也不断丰富和深化,进入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创新的活跃期。初步总结,主要的理论创新观点是:

1.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1977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说:“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②这个判断与1969年四位元帅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当时美苏军事对峙依然严峻,但双方的军备竞赛均受到经济困难的制约。美国因越南战争消耗巨大,其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从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在与苏联的争霸中渐趋守势。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呈现出扩张态势,其军费开支在1965—1978年间平均增速达8%;1979年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开支几乎是美国的3倍。^③尽管苏联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但其经济已显疲态,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举债。尽管投入巨大,苏联并未取得压倒性优势,因而美苏双方均倾向于通过谈判维持暂时妥协。仅1977年美苏即举行了十场裁军谈判,表明双方既无谈判诚意,又对继续对抗争夺力不从心。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0页。

^②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③ 有关数据引自何春超:《国际关系史(1945—1980)》,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296页;章尤:《扩军备战对苏联经济的影响》,《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2期。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后经济自主意识高涨,对西方国家不公平贸易的抗争精神增强,这种力量的发展成为制约帝国主义战争意图的重要新兴因素。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使发达国家得以通过跨国公司和非股权安排等经济手段争夺市场,这更适应非殖民化潮流与国家垄断资本之间妥协的需要。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发展,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和平环境下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修复本国经济的需要也暂时维持“冷战”状态,世界处于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

由此,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①这个新认识是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科学判断。其理论含义是,在世界性基本矛盾所反映出来的多重矛盾形态中,各种矛盾暂时都处于平稳的量变阶段,而且,国际垄断资本争夺世界市场的形式也发生重要变化,侵略、掠夺、军事冲突等旧手段正在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等更隐蔽的经济手段延伸。虽然世界市场的争夺没有丝毫减弱,但主要战场已转向“没有硝烟”的领域。总体上看,这个变化对发展世界生产力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2. 世界生产力的新发展取决于各国的开放

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特别是在国际分工深化的新形势下,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继续扩大世界市场,因此,邓小平指出,开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只有各国都开放,世界市场才能扩大,否则“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②可见,当时世界生产力发展反映在国际关系、外交关系上的突出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开放?世界上谁赞成开放,谁反对开放?这就是划分是否支持生产力发展,划分新的“敌、我、友”关系的主要标准。1984年邓小平进一步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③。他还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为出发点,而是要吸收世界先进的管理方法,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形势来开展这些工作。

从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应当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而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也都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尽管当时还存在苏联东欧的“经互会”的内部市场,但这个市场事实上已经萎缩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当时提出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理论

^①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②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79页。

^③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含义,是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要是按照不同主权国家利益划分的市场,而不是按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联盟划分的市场;而且,这两个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国内市场与资本主义统一的海外市场,这就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苏联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与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外市场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存在两种制度不同的经济,产生社会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市场,但绝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贸易经济往来,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难以割裂的。这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必然性。

3. 世纪之交世界基本矛盾三大问题的理论含义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普遍的、一般性矛盾虽然依然存在,但表现形态更为弱化;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态更为弱化;在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中,什么是由此反映出来的主要矛盾形态,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的新课题。江泽民把这个时代性课题概括为三个大问题:一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二是全球发展的平衡问题,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①这三大问题反映的世界性基本矛盾的理论含义是:

第一,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成为全世界人民的主要诉求。由于苏联解体,世界主要矛盾趋于缓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生命科学为主要标志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不断产业化,促进了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也给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更有利的发展机遇。“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②。“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导方面”,“国家战略更加突出地为全球性综合国力竞争服务”^③。“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终将形成多种力量竞争共处的新格局。各种力量共存,既有竞争和矛盾,又有协调和合作,谁也吃不掉谁,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有利的因素将会不断增多。”^④

第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生产力发展是有利的。新的科技发展和运用,使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空前扩大,加速了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

^①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9—521页。

^②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4页。

^③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0、281、311页。

^④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1页。

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表现,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政策措施,使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解。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技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推动力……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和空间。”^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国的竞争主要呈现以下维度:争夺市场主导权、垄断核心技术以及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对科学技术成果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的能力;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影响能力。这些竞争本质上反映了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较量,将重新塑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经济版图。

第三,经济全球化存在两重性。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反映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对全球发展形成了主要阻碍。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②,从而导致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扩大。因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③这是世界性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最新表现。

第四,不同文明共存是世界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在更多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各国相互依存加强,由此产生了世界性共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需求。突出的表现是怎样看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这是世界生产力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新反映。世界意识形态的主要矛盾,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一对一般的、长远性的意识形态矛盾,深化为战争与和平、单极化与多极化、文明单一与文明多样等更普遍、更多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时代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如何回答人类的文明观和价值观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维护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文明差异导致文明冲突的价值观,不仅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相违背,不利于保护和发展世界生产力,而且是世界文明史观的倒退。江泽民提出,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应是:“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高下之别。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④

4.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胡锦涛提出了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问题,^⑤这是世界性上层建筑改革的新课题。提

①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9、200页。

②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4页。

③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④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0页。

⑤ 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0—282页。

出这个理论观点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是:政治上,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经济上,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国际经济竞争依然深刻复杂;文化上,不同文明交流继续发展,但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安全上,国际战略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态势继续发展,但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依然深刻复杂;治理上,国际协调合作继续发展,但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①这五个“继续发展”、五个“深刻复杂”是世界性基本矛盾在国际政治经济层面反映出来的五方面主要矛盾。

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视角看,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发达国家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巨大资源环境压力正在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抢占未来发展战略的制高点是大国竞争博弈的主要战场,也是决定人类发展命运的主要焦点。从世界舆论的关注看,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的共同关切;一些国家出现的保护主义倒退是值得关注的动向;西方某些国家针对中国提出的“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指向意图,不仅需要澄清,而且需要从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入手。^②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共识的取得都呼唤加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表现是:首先,转换平台。由几个发达国家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必须适应经济实力消长的现实,加强二十国集团的作用,使之成为国际社会讨论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平台。其次,提出当前迫切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包括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方向、原则和改革举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是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原则是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四大改革举措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世界经济理论的探索已进入世界经济政治的最核心领域。

四、习近平全球问题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形成的生产力和对外分工合作产生的经济联系,与以美西

^① 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03—507页。

^② 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2页。

^③ 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8、139页。

方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关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行为和霸权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格局进入深刻调整期,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主张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方面的理论发展,需要有应对挑战和扩大开放的新判断、新认识;主张世界平衡发展、不同文明共存并改革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理论认识更需要深化提高。这就是习近平回应新的时代之问的实践背景以及与之之前理论发展的逻辑关联。

2017年初习近平的新判断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①“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深刻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发展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当今全球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旨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遇、共赴繁荣。这些观点和主张内涵丰富、内在关联、逻辑自洽,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

1. 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愿景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面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此后,他在多个重要外交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深入阐述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的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2017年1月,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个“五个世界”涵盖了国际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领域,符合当代世界各国现实利益的需要,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当前全世界面临许多共同性问题,发展问题、人口问题、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地区冲突等,都困扰和阻碍人类利益的保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为维护人类各种利益而绘制的宏伟蓝图。同时,它也是一个行动纲领。面对全球赤字问题加剧,习近平又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这些倡议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纲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但它绝不是良好愿望的空想,而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在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8页。

^② 参见习近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求是》,2025年第20期。

中国的实践证明,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世界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科学预见,因此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当今国际事务、处理当今世界性基本矛盾、处理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与政治矛盾的基本方法论和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讳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从不将其视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看作现实的符合人类社会利益的、由一个一个行动方案的阶段性目标组成的宏伟蓝图。它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当今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崇高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它既与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是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为争取全人类利益而提出的现实目标。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胸怀天下”理念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不断深化拓展和实践持续稳步推进,从双边伙伴关系到多边国际决议,从区域组织宣言到联合国正式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已经从中国的智慧表达转化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深刻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在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驱动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这种“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状态,正是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真实写照。由于生产力之“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决定了任何国家无法退回到彼此隔绝的状态,相反,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各国间的交往和联系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密,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②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客观现实的科学抉择,回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面回应了全球性问题。当前,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发展鸿沟拉大、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以其前所未有的穿透力打破地理疆域和社会制度差异,任何国家采取单打独斗或试图消极回避策略,都无法化解这些全球性难题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冲击。事实也表明,零和博弈和单边主义的传统策略在应对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性挑战时,效果微乎其微。各国唯有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同舟共济,方能汇聚起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磅礴力量。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② 参见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03页。

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性问题困境的深刻洞察与最有力回应,精准捕捉到这些问题的“超国家”本质,它以“同舟共济”精神取代独善其身的狭隘视域,以“合作共赢”理念取代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倡导“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治理原则,共同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各类全球性难题与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美好的明天。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中华民族“天下大同”文化基因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血脉的价值追求。从《礼记·礼运》中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关于中华民族高远的社会理想的表述,到《左传》中的“亲仁善邻”和《尚书》中的“协和万邦”关于中华民族处世之道的表述,均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对和谐共处、天下一家的向往与追求。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在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②,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到中国—中亚精神,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四大全球倡议,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自觉。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蕴于中华文明中“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外显于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的使命担当。

2. 开放型世界经济:物质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价值观,必须以相应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既包括世界性的生产力,也包括世界性的分工合作的经济联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就是习近平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的经济基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之后不久,2013年9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针对当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③此后,他在多个重要场合倡导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④。开放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为国际贸易、投资等经贸活动的不断扩大与深化。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往来,植根于各国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需要。”^⑤针对当前经济全球化遭到质疑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符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24页。

②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③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37页。

④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97页。

⑤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01页。

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① 尽管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暗流、险滩,但其全球化方向始终没有改变。因此,“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仅仅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而为之,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③。习近平多次引用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等史例,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与世界交往交流的开放气度与和平基因。为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不仅是倡导者,更是践行者。10多年来,通过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功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务实举措,彰显了中国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在肯定经济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生产力发展进步作用的同时,他也指出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对待。”^④ 这些弊端包括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社会发展失衡等,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⑤“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界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⑥。习近平关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四大全球倡议:战略引领

四大全球倡议是解决当前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世界性经济联系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战略引领。

第一,全球发展倡议把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置于首要位置。2021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当时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危机等问题相互交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度受阻,全球发展进程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在此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发展是第一要务,紧紧抓住了当今世界各种矛盾中最突出、最重要的矛盾,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关键。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意义是,坚持发展优先,确立发展在全球宏观政策框架中的核心地位,以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为支点,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全球发展倡议是理念、原则与行动的统

① 参见习近平:《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2016年11月20日,利马)》,《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2日。

② 参见习近平:《在企业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页。

③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283页。

④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2页。

⑤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8页。

⑥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66、485页。

一。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满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最根本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推动各国实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共同发展中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创新与绿色发展原则,强调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绿色为普遍底色,重塑经济动能结构和发展形态,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强环境治理,积极应对环境问题,实现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的统一。全球发展倡议以明确重点领域为行动导向,将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八大领域纳入全球发展进程的优先选项,旨在通过抓住这些“牛鼻子”领域,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为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劲动力。全球发展倡议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贡献中国方案,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依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国际合作平台,国际发展共识不断凝聚,八大重点领域合作机制建设日臻完善,一大批务实合作项目稳步推进,为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揭示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一客观规律。面对地区冲突频发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的国际现实,以及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习近平于2022年4月从全人类命运前途出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郑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他为全人类利益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①。全球安全倡议系统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安全、怎样实现安全”的时代课题。在理念层面,它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超越了传统的、狭隘的、排他的安全观;在原则方面,它遵守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筑牢国际关系的底线,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致力于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在方法论层面,它主张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实现争端的和平解决与国际关系的和谐稳定;在领域层面,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目前,全球安全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明确写入140多份双边多边文件。这不仅彰显了国际社会对该倡议的高度认同,而且标志着全球安全倡议正从中国主张加速转化为国际共识和国际行动。

第三,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观引领。文明共存、文明互鉴是人类共同价值观,是形成开放型世界经济所必须具备的意识形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回答了在文明多样性时代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和谐共处、互鉴互进这一时代之问。在文明观上,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原则,“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51页。

明优越”,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价值观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实现文明的求同存异。在发展观上,重视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主张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输送源源不断动力。在合作观上,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致力于“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①。全球文明倡议自提出以来,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转化为生动实践。例如,2024年6月,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将每年的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成为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消除文明隔阂、增进理解和信任的生动例证。

第四,全球治理倡议是对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的思考,发出了全球治理改革中国方案的呼声。面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的严峻现实,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习近平郑重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针对“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内容,构成一个从“基础”到“规则”再到“路径”,最后到“价值”与“行动”的完整闭环,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想指引。奉行主权平等是全球治理的基础,这明确了谁来治理,即主权国家不分大小,均平等参与治理;遵守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根本遵循,这明确了依据什么来治理,即以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准绳,拒绝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践行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路径,这明确回答了如何治理,即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确保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倡导以人为本是全球治理的价值旨归,这明确了治理为了谁,即最终目的是保障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对共同挑战;注重行动导向是全球治理的落脚点,这明确了治理要见效,要避免空谈,以务实举措推动进程。全球治理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得到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响应,其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号召力源自其对当前全球治理的代表性不足、规则不公、行动不力等方面症结的精准把握,以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辅相成,不仅为应对全球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以及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和行动指南,更展现出鲜明的包容性与普惠性,是中国向全球提供重要公共品的集中体现。作为全球公共品,四大全球倡议以鲜明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共生逻辑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强权逻辑。具体而

^① 参见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言,这种超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超越了“民主—专制”二元对立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运用“民主 vs 专制”标签来划分阵营,制造意识形态对抗,造成文明隔阂甚至文明冲突。而四大全球倡议的“共商”逻辑则超越了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隔阂,强调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制度差异,可以平等坐在谈判桌前,共同商讨全球事务。二是超越了“霸权供给”逻辑。“霸权稳定论”的核心逻辑在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以霸权国的存在为前提,以其提供的稀缺全球公共品为保障。而这样的公共品不仅结构单一,更深刻打上了霸权国的意识形态烙印,难以满足全球各国对公共品异质性偏好的需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大全球倡议的“共建”逻辑不再寻求单一供给,而是通过共商凝聚共识以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让公共品回归其“公共”属性,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各国需求。三是超越了“零和博弈”“负和博弈”逻辑。西方文明背后的主导思想是“丛林法则”,信奉国家间的生存竞争如同自然界的弱肉强食,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国际关系被视为一种“零和博弈”,即一国的所得必然以他国损失为代价。当这种思维与行动走向极端,就出现了“负和博弈”,即只要竞争对手所受损失更大,“双输”乃至“多输”均在所不惜。^①而四大全球倡议的“共享”逻辑强调利益的交融与成果的普惠,主张通过共商共建途径做大利益蛋糕,让所有参与者在增量中分享红利。这与“零和博弈”固守总量、此消彼长的思维截然不同,更与“负和博弈”相互消耗、总量萎缩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

4. 全球南方现代化:时代潮流

全球南方现代化是形成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必然结果。从世界发展史看,人类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始于英国、西欧和美国等当今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到信息化历经250年左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结束,但人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中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先导的全球南方现代化大幕开启,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现代化的浪潮。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②习近平关于全球南方现代化的论述正是对这一历史潮流的深刻洞察和高瞻远瞩的历史展望。

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持续攀升,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在经济规模上,实现了存量与增量的双重跃升:按名义价值计算,“全球南方”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25%上升至2024年的41%;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不足40%跃升至近年约80%。^③在贸易领域,“全球

^① 关于负和博弈,参见张宇燕:《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机遇与应对之道》,《欧亚经济》,2026年第1期。

^②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26页。

^③ 参见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报告2025:携手为全球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45页。

南方”国家内部联系显著强化,内部货物贸易额从2010年的3.04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6.18万亿美元,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也由39.88%攀升至45.63%。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其吸引外资占全球比重从2005年的34%升至2024年的约60%,对外投资占比亦从12.3%增至30.5%^①,成为资本流动的双重引擎。在科技创新方面,金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与科技论文发表量已超越G7国家,成为全球创新新高地。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中国引领新能源领域,印度深耕制药与软件,印尼、智利等国依托关键矿产成为产业链关键参与者。上述事实表明,“全球南方”正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参与者”成长为增长的重要引擎,全球经济重心正在经历历史性的结构性转移。

随着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地位的提升,“全球南方”已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机制中影响力持续彰显。从G7到G20的转变,标志着新兴市场国家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核心,开启了新兴经济体引领议程设置的新篇章。2023年非洲联盟成为G20正式成员,进一步壮大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多边治理中的力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中国和印度投票权分别升至第三和第八;世界银行改革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从44.06%提升至47.19%,制度性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二是自主发起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影响力不断攀升。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成员中包含2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7个G20成员,拥有全球72%的稀土、75%的锰和50%的石墨,石油供应占比达42%,在全球能源资源领域掌握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更适配的融资选择,有效弥补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足。三是独立性与自主性意识显著增强。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发展任务,使“全球南方”国家在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时倾向于独立自主。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130多个“全球南方”国家未参与对俄制裁;2024年9月,中国、巴西等17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和平之友”小组,推动以和平协商方式化解冲突,充分展现了“全球南方”国家不选边站队、坚持劝和促谈的集体立场。

经济实力的提升与治理话语权的增强,为“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向“全球南方”展示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丰富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国“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②“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③。这份根植于“全球

①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发展数据库。

②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65页。

③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41页。

南方”的赤子之心,贯穿于习近平的外交实践。2024年9月,他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了“全球南方现代化”的倡议,号召“凝聚起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①。在这次论坛上,他系统阐释了全球南方现代化的六大特征,即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这六大特征相辅相成,构成了“全球南方”实现现代化的系统性方案,为推动“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此后,他在多个外交场合不断重申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共同现代化,并以坚定的行动将这一号召转化为携手同行的承诺。2025年6月,他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提出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在该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双方表示要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强合作,仅在本次峰会上就达成110项合作成果,涵盖合作文件、合作举措与倡议、重要活动三类。共逐现代化之梦并非意味着要按照既定的发展模式推进,实际上,现代化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现代化往往涉及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家治理效能等诸多领域的深刻变革。对此,习近平在多个重大场合明确表示,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同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他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指出:“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共享发展经验和最新技术成果,促进数字基础设施联通,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培育新质生产力。”^②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差异显著,共同推进现代化需要结合各国实际。他指出,“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③总之,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愿同“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之路上携手前行。中国与非洲共逐现代化之梦、中国与中亚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5.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路径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的基本路径。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两个最突出的矛盾:一是话语权垄断与多元共治的矛盾;二是国际秩序中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主要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诉求,之后也未能随“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而实现同步调整,致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严重不足。这种包容性不足的缺陷在以下关键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投票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41页。

^② 参见习近平:《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推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2025年6月17日,阿斯塔纳),《人民日报》,2025年6月18日。

^③ 参见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2023年8月22日,约翰内斯堡杉藤会议中心),《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

权分配上,尽管世界银行、IMF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了一部分投票权,但未触及权力结构的核心,未能真实反映出“全球南方”崛起引起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截至2025年底,金砖11国在IMF的投票权为18.86%,远低于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超过1/3的GDP比重。美国凭借16.49%的投票权仍享有一票否决权,成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在议程设置上,发达国家凭借其主导地位,将议题向投资便利化、数字贸易等对其有利的领域倾斜,而贫困、债务、气候变化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结构性议题长期被边缘化,全球议程难以有效回应紧迫发展需求。在规则、标准制定上,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不仅在货物贸易、投资规则、知识产权等传统领域主导规则,更在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设置过高标准,系统性巩固竞争优势。

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主义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融入多边主义体系而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美国曾是全球多边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但其驱动力始终基于成本收益的国家利益考量。随着收益下降与实力相对衰弱,美国角色发生逆转,从多边主义的“旗手”沦为单边主义的“急先锋”。近年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大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与保护主义:滥用“长臂管辖”凌驾国际法之上,瘫痪WTO争端机制,破坏多边规则,组建“小院高墙”式排他联盟,以“脱钩断链”阻断技术扩散,推行“对等关税”,公然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些行径不仅扰乱全球供应链,更剥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市场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机遇。美国所代表的单边主义逻辑,与“全球南方”追求公平、公正、包容的多边主义理念根本对立。面对霸权行径对发展权利的侵蚀,“全球南方”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单边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变革。正如中国古代春秋末期,周天子权威式微,天下大乱,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诸侯战争不断,人民惨遭涂炭,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维持天下秩序,于是出现了春秋五霸。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不以武力而以仁德服众,联合各诸侯国,形成天下共治,留下“文霸”的历史美名。孔子赞扬管仲所起的作用:“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①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正是吸取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果。

针对全球治理的深刻矛盾,全球治理倡议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②

当今全球治理改革的具体任务:一是推动世界银行、IMF和WTO三大机构的机制性和功能性改革。机制性改革涉及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方面。例如,进一步推动世界银行和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

^① 参见《论语·宪问》,杜道生:《论语新注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8页。

^②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47页。

额;推动WTO决策程序改革,探讨包括引入更为灵活的“关键多数”表决或诸边协议等创新机制,以提高决策效率。功能性改革涉及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信息不对称等方面。例如,在IMF方面,减少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负外部性、约束大国经济政策的外部性;在世界银行方面,增强发展援助的公共产品属性、加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视程度;在WTO方面,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功能等。^①此外,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全球南方”的多边金融机构撬动更多发展融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包容性的基础设施与绿色转型支持。二是在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框架下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系统设置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的议题。发挥联合国作为多边对话合作平台的作用,持续推动基础设施、减贫、发展融资、气候适应等发展议题纳入常态化议程。在G20、APEC等机制中,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政策协调与立场联动,推动形成“议题联盟”,以提升议程的影响力。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全球南方”主导的多边机制中强化议题引领,通过加强机制间的协调联动,推动相关议题向联合国、G20等更广泛的多边平台延伸,推动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切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议题。三是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形成符合“全球南方”自身发展需求的国际公共品。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将“全球南方”发展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则体系。在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等框架内,通过深化本币结算合作、完善相应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立应急储备安排,旨在减少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与潜在风险。依托金砖合作机制,“全球南方”在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主权等议题上加强协调,共同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治理框架。

五、结语

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每个时代、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奥秘,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人民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矛盾,同时,唯物辩证法还告诉人们,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还存在一般矛盾与特殊矛盾的关系,普遍存在的矛盾未必是特定时间、空间里的最主要矛盾和最突出的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世界经济理论能够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寻求回答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的新答案。习近平关于全球问题系列重要论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回答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新境界。

^① 参见李济广、李云婷:《全球经济治理功能性改革与机制性改革:基于“双失灵”理论框架》,《国际经贸探索》,2025年第5期。

Xi Jinping's Discourses on Global Issues: Expanding the Marxist Theory of World Economy

Pei Changhong, Ni Jiangfei

Abstract: Engels stated that political economy is a historical science, which means that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s one of its inherent qualities. At present, the world is confronted with increasingly severe global challenges, including deficits in peace,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Standing at the forefront of historical trend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applied the standpoint,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Marxist world economic theory to advance a series of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global issues. In doing so, he has creatively put forward many majo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ointing the way forward for historical progres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Xi Jinping's discourses on global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world economic theory. This paper proceeds by taking as its research method the analysis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worldwide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worldwide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On this basis,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foundations of Marxist world economic theory, examines the new understandings and judgments form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regard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further expounds the political-economic logic underlying Xi Jinping's discourses on contemporary global issu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object of study of Marxist world economic theory is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worldwide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between the worldwide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aiming to reveal the laws governing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worl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capitalism,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value, and the dual character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Marxist world economic the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veloped Marxist world economic theory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 has appli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rofoundly grasped the broader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times, and, in response to global issues, advanced a series of original and contemporary new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ideas. In doing so, he has elevated Marxist world economic theory to a new stage suited to the times. Rich in content, internally interconnected, and logically coherent, these views and propositions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approaches to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e innovation and academic value of this paper lie in its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global issues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world economic theory, there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epening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Marxist world economy theory; open economy theory

JEL Classification: B24; F55; P21

[责任编辑:王燕梅]